

梦回清华园

○陈荣刚（1978级精仪）

引子

1976年12月，我高中毕业了，上山下乡成为唯一的出路。1977年元月5号，刚过16岁的我背着背包来到了插队地点：安徽省泗县红塔人民公社大张大队第九生产队。此后，我每天与社员们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。我是这个生产队的唯一知青，身份的确有些特殊。

几个月后我的工作得到了社员们的认可，于是生产队交给我三项重要工作：仓库保管员、面坊收费员和饲料过磅员。其中保管员工作最重要，因为仓库里存放的是种子、化肥、农药和农具，几乎是生产队的全部家当。面坊是生产队唯一的副业，每个月可以为生产队创收二三百元，在当时已是很可观了。作为饲料过磅员只是在夏天才忙一些，放暑假的时候，孩子们可以到湖里割草喂牛，所以每天吃早饭以前和傍晚的时候，都要为这些孩子们割的草过磅并记工分。有一天，由于自己的疏忽，发生一件很危险的事。一天早上，一个大孩子割的草很多，可能超过一百斤，我在称重时把秤砣移到秤杆的杆头，突然秤砣从秤杆头部滑落，秤杆在另一端的一百多斤青草作用下，迅速向上翻转打在我头部右边的太阳穴上，当时就晕倒在地，等我醒过来时右眼框出现一个大紫包。经过一个多月才消退，社员们都说

我命大。从那以后，我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变化，不时在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招工或推荐上大学啊？

高考

1977年下半年邓小平副总理复出，果断恢复了停止多年的高考，于是希望出现了。我是个幸运儿，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参加了两次高考，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社会。

1977年11月中旬，我向生产队和大队请了一个月的假，备战高考。从小学到高中毕业，我所受教育的10年，刚好是“文革”10年，文化基础也就是初中水平，要参加高考还需要花大力气恶补才行。等到12月10日、11日考试的时候，用于复习的时间不到一个月。巧合的是，我所在的考场是我上初一时的教室，监考的老师是我曾经的班主任，所以考试时并不紧张，可仍然是在茫然之中完成了我的第一次高考。这次才考了184分，刚刚过了安徽省的180分预选线，最终没有被正式录取。考试结束后就立即回生产队干活，任务是挖河。

转眼到了1978年4月，我又得到了确切消息：高考时间改在当年7月份考试，而且是全国统考。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，不能放弃。有了上次高考的经历，知道自己短处所在，于是向生产队表明态度：给

□ 值年园地

我两个月的假，如果考不上就回来老老实实地干活再也不考了。生产队长爽快地批了假，并给我 100 斤小麦作为这两个月的口粮。于是来到我父亲曾工作过的一所乡村中学，借住父亲好友的防震棚，除了吃饭睡觉每天看书十几个小时，所有的科目复习以自学为主，可是政治、语文还是有难度，在临近考试的半个月跟随应届毕业班听听这两门课程。

很快迎来了 7 月的 8、9、10 三天高考日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考完之后，我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：“今年能考上了。”第二天就乘车回到了生产队，让我吃惊的是生产队里把我住的土坯房给拆了，队长说：“小陈，你考上大学就走了，也不用住这儿。如果考不上，村子里就给你重新盖，你就先凑合住在放草料的屋子里。”没办法，只好遵从队长的安排。一直等到 9 月中旬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，很是着

急，我的成绩是 405.5 分，在全县排第二，应该能考上一所大学的，心中惴惴不安，于是就请假回家住几天。刚到家的第二天就接到电话，说通知书已寄到了生产大队，是清华大学革委会寄出的。我还挺纳闷的，是清华大学？由于中国科技大学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从北京搬迁到安徽合肥，所以安徽考生大多喜欢报考中国科技大学，我也不例外。后来才知道，清华大学 1978 年在安徽省负责招生的是胡显章老师，是胡老师经招生办调剂把我录取了。我永远感谢胡老师对我的厚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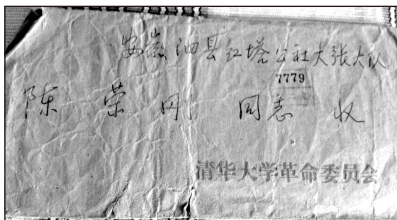
入 学

1978 年 10 月 9 日下午 6 点半左右，宿县火车站，父亲把我送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。在进站托运行李时遇到考入清华机械系锻压专业的李浩，李浩是宿县人，于是我们一路结伴，前往北京。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，能上清华出乎我的预料，内心总有些惶恐和不安，这种感觉持续了一路，也持续了以后的好几年。

10 月 10 号上午，火车进了北京站，出了站就看到清华的新生接待处，凭通知书上了学校的校车。当校车路过长安街天安门，我的双眼有些湿润了，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会经过这个地方。校车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行驶进入清华南门，一直开到大礼堂门前停了下来。从南门到大礼堂这段路，我感到很漫长，以为到了荒郊野外，当时映入眼帘的是路两旁一人高发黄的蒿草，还有许多防震棚，几乎没有上大学的感受。下车后，一位老师或许是高年级的学长把我送到 11 号楼 504 室。进门后看到三位北京的同学熊晓鸥、英新、



我的准考证



我的录取通知书信封

张大信都已经就位了，我也找到了我的铺位，是靠近门口的左手边上铺，下铺是周玉健，玉健是504室最后到的一位同学。同宿舍的还有郭堃、黄涛、李洪斌。就这样8位来自北京、安徽、江苏、山西和辽宁的兄弟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，聚集到了清华园11号楼504室，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。

我们在11号楼504室大约住了两年，然后搬到了307室。8位兄弟中，郭堃来自山西太原市，年龄最长是当然的老大哥，郭兄也确实有老大的范儿，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事都问他，就拿这所学的“机械制造工艺、设备及自动化”专业来说，我们几位都是稀里糊涂，只有郭兄略知一二，因为郭兄有一位亲戚曾在“文革”前就读精仪系。正式上课的前几天，几位小兄弟在郭兄的带领下，来到海淀文具店买绘图仪、丁字尺、三角板以及各种硬度的绘图铅笔。当时我身上的钱不够，是郭兄替我垫付一部分，等家里寄来钱以后才还给他。到了周末，北京的同学都回家了，剩下的哥几个想进城看看，因为我们大多没到过北京，再加上年龄小、胆子也小，于是郭兄第一次带着我们几位逛西单、王府井。郭兄曾在太原铁路局工作过，常出差进京，比我们见多识广。郭兄的学习精神也是值得佩服，他从不睡懒觉，基本在6点多就起床了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也早起到东大操场去背单词。

1979年的寒假很短，我们班有许多外地同学都不回家，

一开始我也不打算回家，无奈思乡心切和学习压力大，造成我第一学期有段时间神经衰弱，是郭兄给了我很多安慰。最后我决定回家，考完最后一门课后，郭兄和我一起进城并在他亲戚家吃了晚饭，然后亲自把我送到北京站，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。

三位北京哥儿们都是极具个性的人物。英新是火热、开朗、嫉恶如仇；晓鸥是率真、干练、快人快语；大信是沉稳、内敛、意志刚强。英新仅仅在清华大约三个月，就被选派出国留学了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之间多年的友谊。在504，晚上10点半熄灯后，睡觉前的卧谈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。我们有时也谈论一些敏感话题，在当时还比较左的政治形态下，英新对“文革”的臧否，给我留下很深印象。后来逐渐地了解到英新的父亲是北京某高校地学系著名教授，在“文革”当中被迫害致死，这使他过早地尝到人间的巨大痛苦，因此比一般同龄人要成熟得多。他一直努力证明自己，告慰父亲在天之灵。



“504”的兄弟们，前排左起：周玉健、李洪斌、英新、黄涛；后排左起：陈荣刚、郭堃、熊晓鸥、张大信

□ 值年园地

1979年元旦，当我们即将分别之际，504的弟兄们一起到五道口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作为留念。

熊晓鸥同学出身于双军人家庭，其身上的特质与普通百姓家庭的孩子有所不同，这种感觉当时说不出来，后来在我到军队院校工作后才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，用现在的一个时髦的字眼来描述就是“爽”。关于张大信同学，我最敬佩他的有两点，一是英语水平高尤其是口语和听力，二是意志坚强。虽然1978年高考英语成绩不列入总分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大信的高考英语成绩是我们班最高的，大概在70多分，而我才11分，他分在A班而我分在E班。给A班上课的是吴先生，吴先生是“文革”前的英语教授，有一次不知为何事吴先生来到504室找张大信，他们一直用英语对话，我在一旁愣是一句也没有听懂。所以我在以后的英语学习中没少麻烦大信同学，从发音到语法再到学英语的方法等等，大信都是娓娓道来，使我受益匪浅。说到意志力，大信也有独门绝技，在平时日常学习、生活当中他习惯把每一天的时间分配好，什么时间做什么都严格记在一个笔记本上，多年坚持不懈。有一阶段，大信参加了学校武术队，主练“形意八卦”拳法，为了掌握该拳法的精髓狠下功夫，拿大顶、下腰、站桩、马步等是样样苦练，同时还学习中国传统气功，最后得到了“形意八卦”拳法的传人王老师的认可和赞许。

李洪斌和黄涛分别来自辽宁省的本溪、锦州，这两位都是身高1.8米以上，而且颇具体育特长，善跑。在1978年秋季新生运动会上崭露头角，双双进入学校

体育代表队。经过几年的训练，李洪斌在1982年全国大学生首届运动会上就取得两项好成绩：4×400米接力亚军，400米跨栏季军，我们为有这样的同学感到自豪。按出生年月排序，黄涛同学在504室排在第八位，最小，我们都称他为“老弟”。黄涛老弟的优秀在制81班是有目共睹的，从本科、硕士、博士一口气在清华读到头。1979年元月以后，英新同学就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外语为出国做准备，黄涛就挪到了英新的铺位，他常常在晚上10点半熄灯后，为了避免打扰其他同学的休息，用一种军用厚帆布把床的对外两面围上，自己打着手电筒继续看书学习，把在体育训练中所占的学习时间弥补回来。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他搬到代表队统一居住，黄老弟的成绩在制81班一直名列前茅。

我的下铺是周玉健同学，他来自江苏建湖县，与我老家安徽泗县，从地图上看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，同属于黄淮海平原。我们俩是同一年出生，也是同一年高中毕业并经历了插队落户，又都是来自县级城市，所以看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比较接近。在大学五年里，我们一直是住在同一宿舍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对事物的认识、理解快，接受能力强。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题或画法几何题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往往到最后是他的理解正确。在大三时，学校流行打桥牌，玉健很快就掌握了桥牌技巧和要领，并和孟广彬、陈汝强、梅建南组队参加比赛，而且是输少胜多。

在毕业30年即将来临之际，我仿佛又回到了11号楼的504室与众兄弟们再聚首，是清华园把我们紧紧地联接在一起，我们的梦想是从这里起飞的。